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管桦：从烽火硝烟到笔墨人生

□ 本报记者 刘笛

暮春季节的丰润，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甜的味道，那是槐树的花香。管桦，那个以《小英雄雨来》闻名中国文坛的作家，他的根，深扎在这里。还乡河，如玉带般环绕丰润城区，河畔绿柳轻垂，河水静静流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管桦笔下的故事。

从21小区早市再往北走，向西拐进曹雪芹文化园，将热闹喧嚣抛在身后，管桦园、管桦陈列馆就出现在眼前，陈列馆门前的紫藤花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这里，我们可以循着时间的轨迹，了解管桦融合了战士、文人与艺术家的一生。

管桦，原名鲍化普，1922年生于丰润县女过庄（今属丰润区）。“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个小村庄。芦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黄绿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12岁的雨来就是这村里的。”童年的管桦在还乡河畔的芦苇荡中度过，与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传递鸡毛信。他的父亲鲍子菁是一位乡村教师，也是抗日志士，后来在战斗中牺牲。父亲的革命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管桦的成长，他在自述中多次提到，父亲的牺牲让他更早懂得了什么是民族大义。父亲的刚毅与淳朴，也成为管桦一生创作的底色。

1940年，父亲把管桦和弟弟送去参加革命，年仅18岁的他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先后在冀东抗日联合会、冀东区党委机关报《救国报》、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工作。陈列馆中一张管桦蹬着梯子 in 城墙上写字的照片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是1945年的中秋之夜，八路军攻打玉田县城时，他勇敢地登上城墙，满怀激情地写下自己即兴创作的街头诗，歌颂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抗战时期管桦的照片多是与战友们的合影，那是一个个充满热情和朝气的笑脸，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些年轻的身影用钢笔对抗子弹，以胶片定格历史，在血色山河间，谱写一曲无畏无惧、壮志满怀的青春之歌。

“我被战争的洪流从女过庄小小的港湾，卷到奔腾呼啸的大海。我的生命扬帆前进，

头上滚卷着炮火的烟云，亮着骇人的闪电，响着惊心动魄的雷声。这个哺育着我，又浮载着我并推涌着我前进的波浪，击打着苍穹，‘大风高歌壮士曲，浪花飞写英雄篇’。”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不仅塑造了管桦的人生观，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感积淀。发表于1948年的《小英雄雨来》正是这一时期的结晶。这部描写抗日小英雄的中篇小说，以其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乡土气息，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管桦笔下的雨来不是概念化的英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机智勇敢的乡村少年，这种对“人”而非“符号”的关注，成为管桦文学创作的一贯特质。

陈列馆西侧与小英雄雨来纪念馆遥相呼应。纪念园内，雨来雕像双拳紧握、目光坚毅，底座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的铿锵誓言，让人不禁驻足读出声来。亲历冀东抗战的残酷与军民同心的壮烈，这不仅塑造了管桦“战士作家”的身份，更让他坚信：“文学应如钢枪，为民族存亡发声。”

和管桦的文学作品一样有着深远影响的，还有他的歌词。管桦的夫人李婉曾回忆他们是在6月1日结婚的，或许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机缘，让管桦拥有一颗童心，才能写出那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儿童歌曲的歌词。“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际的稻田。”（《我们的田野》）“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创作的歌词大多充满童真童趣，以纯净的意象勾勒出新中国少年的精神图景。这些歌曲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校园与舞台传唱，成为永恒的经典。

管桦陈列馆的中心有一处天井，蔚蓝的天空下，穿过一片竹林中的小径，我们就能到达管桦的绘画世界，感受他最爱的墨竹，走进他思想的竹林。“我画竹，是画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力量，画人的思想情操。画上的粗干大叶，就是表现这种自身的力量。”馆中珍藏着

他画的十几幅墨竹，这些竹子“根生大地，未出土时便有节”。管桦爱竹，居住的院子里种满了翠竹，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景色能比得上朝霞映衬下的草地中冒头的竹笋和晚风中摇曳的竹叶，他在寂静中和竹子一起沉思。他像他笔下的墨竹，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却向往着精神的自由天空。

管桦的作品里总能看到故乡的影子。“我的童年是在还乡河边度过的，那里的芦苇、野鸭、柳树林，还有乡亲们的笑声，都刻在我的记忆里。”“女过庄，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个旅店，这个河北省丰润县的普通村庄，是美丽的……”管桦在女过庄的老宅不仅是其家族记忆的载体，更是他与故乡血脉相连的纽带。20世纪50年代，他曾举家迁回，妻子李



晋元先生生前身后琐忆

□ 刘士裕

—
我认识云南画院院长、云南省美协主席王晋元先生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

1995年，新华社记者贾靖宏捐赠给家乡的书画珍品中，有晋元先生一幅名为《山花》的国画。第二年，经贾靖宏介绍，我同晋元先生取得联系，约他为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书画展捐赠作品，十几天后便收到他寄来的《黑牡丹》，画面右下方特意加盖一枚“乐亭”印章，以寄托游子对故乡的眷恋。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中



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他又寄来《幽香》《梅花》两件作品，以供展出。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晋元先生的巨幅佳构《遍青山，红了杜鹃》。这幅画与上面几幅小品大相径庭。作品是在1990年应邀参加由天安门管理局举办的创作活动时绘制的，画面综合运用工笔与写意、没骨与勾勒、水墨与重彩等多种技法语言，展现了云南漫山遍野杜鹃花盛开的壮观景象，呈现出当代花鸟画的崭新风貌。

而我见到晋元先生，已经是2000年6月下旬的事了。

当时，我是和同事到云南考察顺道拜访他的。由于人地两生，且是傍晚，我在昆明市内绕了好大阵才找到省科协宿舍大院。只见大门口站着一位身着休闲服、面色清癯的长者。上前探问，才发现被我撞了个正着，原来晋元先生接到电话，在门口已等候了半个多小时。

先生家里只有几件旧式家具，布置很简单，更谈不上什么装饰。夫人蔡仲明大姐身体欠佳，打过招呼后便回房间休息。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攀谈，从童年时光到大学生活，从家乡发展变化到云南风土人情，从绘画艺术到花鸟画创作，谈得很投机。晋元先生1939年出生在河北乐亭古河乡吴家兰坨一个普通农家，长大后随父亲辗转到北京、天津读书，1959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分科后拜在郭味蕖先生门下研习花鸟画。晋元先生向我讲述了这样一段趣事：当时他本可以留校或安排到天津工作，由于一位分配到云南的女同学家家庭发生变故，组织上动员他去云南。在犹豫彷徨之际，郭味蕖先生鼓励他：“趁着年轻，你应该去，你可以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云南就是一个最

合适的地方”，从而打消了他的顾虑，克服来自家庭、社会的阻力，毅然决然地来到云南。

临别时，我邀晋元先生方便时回家乡看一看，办一次个展，他一一答应了。当我索要资料，以便向家乡介绍他的艺术成就时，晋元先生却说：“还是多宣传一些老艺术家吧，我实在没什么可写的。”要知道，这时他已是中国花鸟画创新的典范、云南美术界领军人物，成就斐然。这次拜访，也是我们唯一一次交谈，其平易近人、谦虚随和的大家之风，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二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唐山下了场大雪。傍晚，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可窗外的雪花还在飘着。广东画院王玉珏院长打来电话说：“晋元先生已于11月22日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怎么可能呢？两个月前不是还好好着的吗？”我喃喃道，虽不愿面对这个噩耗，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

第二天上午，我挂通蔡仲明大姐的电话。这位同晋元先生相伴一生的坚强女性，还没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声音低沉，断断续续地对我诉说：“晋元从春天开始，胃部就感到不适。他已退休，但仍担任着云南画院名誉院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职务，整个夏天他都在忙碌着。先是到北京、青岛、大连出席美术界的活动，后又作为评委，参加‘全国画院双年展·首届中国画大展’‘百年中国画大展’的评审工作。回到昆明后，尽管胃部时常出现疼痛，他还是强忍疼痛继续作画。9月25日，晋元作为中国美协代表团成员赴台湾访问交流。出发前，我见他吃不下东西，人也明显消瘦，几次劝他不要去了，但他坚持说：‘如果不去，对不起主办方，因为已经筹办了很久，这不好。’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与同事走访了很多地方，活动也安排得很满。回来后，晋元自己也感觉身体有点儿不大对劲儿，浑身疲惫，有一种很累的感觉。在家

人和朋友的催促下，晋元才去医院，住院做详细检查。几天后，诊断结果是十二指肠癌，且病情急剧恶化，身体很快消瘦下去。入院十多天，加上入院前半个月，体重就掉了十一二公斤。11月18日经过10多个小时的手术，晋元平安下了手术台，但随之而来的并发症一直纠缠着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11月22日下午3:00，晋元停止了呼吸，悄悄地走了。”

晋元先生走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孙克感情凝重地写下了《期待大师——中国画的世纪思考》一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对晋元先生病逝的悲痛和惋惜。作者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向当代的画家们呼唤大师，热切地期待大师的出现。

晋元先生走了，华夏艺术天空里一颗璀璨的新星陨落了。这位极有希望成长为未来大师的杰出画家英年而逝，倒在了离大师顶峰不远的路上，怎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三

晋元先生走后几年，蔡大姐一直用写日记的方式，同在天堂里的丈夫说心里话。她了解丈夫要办个人画展的心愿，在2005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办个人画展，我正在联系之中，这样对你多年在云南美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是一种认可和肯定。”同时，她心里还在酝酿着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将先生四十余幅精品画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她把把这个想法同儿子王云勃、女儿王月商量时，得到他们一致赞同。2008年5月9日，中国美术馆来人郑重地从蔡大姐手里接过了晋元先生的42幅作品。当晚，她心里五味杂陈，夜不能寐，在第二天早上的日记中写道：“捐给国家艺术珍品，这是我的一种信念。要说舍不得，这42幅精品放在我卧室里，就如晋元在身边。作品送走，我心里是一种难言的空旷、失落。但作品只有放到中国美术馆这一最高殿堂，才是最好归属和寄托。晋元，你是否也赞成这样的举动？所选作品是否符合你的意愿？”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注释】

三家：指在鲁国当政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又称“三桓”。

《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

【译文】

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孔子（批评）说：“‘助祭的是四方的诸侯，主祭的是庄严肃穆的天子’，这诗怎么能在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唱呢？”

“八佾舞于庭”不可，以《雍》彻”亦不可，孔夫子监督得很严。这个时期他还在鲁国，也许正做着大司寇，身份地位高，才有机会看到“八佾”，听到《雍》。每批评一次，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打击“三桓”一次。《礼记》说：“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以礼教化民众，以礼改风俗，正人心，以礼治国。

春秋时期，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手里。“三桓”觊觎鲁国政权久矣，看来还常常冒犯越界，来试探国君的反应，揣测国君的心思，挑战国君的权威。鲁国国君敢怒不敢言，但想说的话却被孔子说了出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直接点出他们的狼子野心，震慑了“三桓”。

多尔袞为大清国开基定业，战功卓著，权倾一时。顺治时，多尔袞晋升为“皇父摄政王”，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也就是说，他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多尔袞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凡一切政务，多尔袞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顺治七年，多尔袞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致死。顺治帝闻之震悼，先追封礼葬，两个月后，又挖坟鞭尸，夺去一切封号。这一切的祸端，都源自多尔袞的傲慢愎愎。

“礼者，君之大柄也。”（《礼记》）典章礼仪规定天下秩序，是国君治国的法宝，树立权威的重器。“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礼记》）古人重祭祀，宗庙之事，非小事。不合身份的祭祀行为，体现的是政治上的暗暗争斗。孔子批评“三家”，是防患于未然，在他们野心未成熟之时，就挫败扑灭。



2006年

11月10日，“王晋元艺术回顾暨捐赠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展厅里各个时期的125幅作品，完整地反映了晋元先生摆脱传统折枝花卉的局限所创立的“全景截取”独特模式发生、演变、成熟的过程。

接到蔡大姐请柬，我如约而至，并将唐山市美术家协会的贺信交到她的手中。这天，蔡大姐精神很好，亲手送我一本“大红袍”《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王晋元》，并陪同我和唐山籍著名花鸟画家李晓明先生观展留影。我们边走边谈，其间蔡大姐说到两件事：

一是晋元先生从小受到乐亭皮影的熏陶，在中央美院就读时，和学长张步、齐慧慧发起成立一个皮影社，利用课余时间，不定期地与校外几位唐山籍学生演皮影戏，前后坚持了两年。

二是晋元先生1953年离开乐亭后就没回过老家，他生前制有一枚“乐亭”印章，以解乡愁。这么多年，只要家乡有需要，他都全力去办。他常念叨退休后抽时间去乐亭老家看望，没想到突然就被病魔击倒，永远离我们而去。晋元先生逝世后，曾在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办过画展，如有可能，在唐山办一次回顾展，让家乡父老目睹他近年辛勤耕耘绘出的花鸟山水画，岂不是一件很有意义、有趣的事嘛！

在参观后返唐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晋元先生笔下雄浑壮阔的热带雨林、云岭江河、雪山草甸、鸟蒙金沙、高原气象，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这是他心灵的绽放、生命的迹化。晋元先生已去，但画还在。我想，当家乡父老观赏到这些花鸟山水佳作后，会永远记着这位彩云之南的游子，怀念他的风采，为他骄傲。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